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际移民动向

阿德拉·佩勒格里诺

导 言

拉丁美洲的历史向来深深打上国际移民的印迹。在过去的 500 年里,洲外移民对这个洲的人口有重要影响。先是殖民者来此定居,随后是贩运非洲黑奴,最后是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欧洲人亚洲人的迁入。

在过去 50 年里,拉丁美洲已经从一个人口迁入地区转变为人口迁出地区,移民或是在本地区内部迁移,或是迁往发达世界,特别是美国。

本文是一份报告的概要。该报告是根据乌拉圭共和国大学社会科学部人口项目与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人口统计中心(CELADE)签署的一项协议而起草的。这项工作的基础是 CELADE 的拉丁美洲国际移民(IMILA)研究计划所收集的统计资料。这一数据库包含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出生人口的信息,以及其他地区人口普查中的有关信息。它始于 1960 年代,迄至 1990 年代,目前包括四组人口普查资料。IMILA 研

究计划开创了国际移民信息的收集和系统化工作。

经济和社会背景

在大多数拉美国家,人口趋势的变化始于 1930 年代,具体时间自然国与国不同。阿根廷和乌拉圭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在 19 世纪末已有显著的变化,而其他国家的这种变化只是在 20 世纪中叶才明显起来。拉丁美洲人口的平均增长率在 1955—1965 年间达到最高水平(每年高达 3%)。从绝对值来说,其人口从 1950 年的 1.65 亿增长至 1990 年的 4.41 亿(United

Nations, ECLAC-CELADE, 1993)。从那以后人口增长率便逐渐减少,有些国家——包括巴西——的出生率在短期内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从 30 年代开始,主要由于核心国家的危机,一些拉美国家的基于农业和出口的经济模式转变为内向发展为主的模式,其工业发展的首要目标也是国内市场。借助

阿德拉·佩勒格里诺(Adela Pellegrino)是乌拉圭蒙得维的亚市共和国大学社会科学部人口项目的主任。她的研究兴趣包括人口史和国际移民,在这两个领域有多部著作出版。1994 年至 1998 年间,她是联合国人口科学研究(IUSSP)南北移民委员会的成员。Email: apellig @ fcsun.edu. uv

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的推动力,拉美各国的经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由于工业比重的增加,一些国家(阿根廷、巴西、哥斯达黎加、智利、乌拉圭和墨西哥)呈现出经济的多样化。

大多数国家经历了持续经济增长。在1950—1978年间,这个次大陆的经济平均每年递增5.5%,高于所有市场经济的工业化国家,也高于其他发展中地区(ECLAC,1980)。

1950—1978年间,尽管这个地区的人口增长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但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仍然翻了一番。然而,比起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其人均GDP的增长还是较慢的。拉丁美洲的收入分配不公在国际上一直很突出,在此期间,它的经济增长成果也同样明显地分配不公。

1950—1978年间整个地区的经济形势总的说来比较有利。但各个国家的发展势头并不相同。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在工业化程度和人均收入方面本来处于领先地位,但在那30年间却经济增长最慢。其他国家,包括巴西、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和委内瑞拉,转型虽属后来,增长率却居上。

进口替代型工业化经济模式的局限,在60年代已开始显现,到它充分暴露已是70年代。经济危机逐渐困扰这个地区,但也并非一律。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放慢了,而另一些国家(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多米尼加共和国、危地马拉和巴拉圭)却达到历史的新高。

在80年代,“债务危机”广泛蔓延,导致拉美多数国家的人均GDP下落,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降低,贫困和匮乏的程度加剧。收入分配从整体上说是很不公正的,而此时在阿根廷和乌拉圭等国家则坏到极点,这些国家在历史上本以高度的社会同一而著称。

拉美国家在“失败的10年”间不得不面对若干挫折。根据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委员会(ECLAC)的说法,经济危机明显表现为:

这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指标同时而且持续地衰落。这不仅仅表现为生产的萎缩或增长率的急剧下滑。就业形势已愈来愈坏,实际工资减少,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而且日益蔓延,涉外部门的问题更加尖锐。国家财政系统面临种种危机,经济衰退,利率上调,货币急剧贬值,财政屡屡告急,这些使宏观经济形势不断恶化(ECLAC,1996,11)。

政府应对危机的是一揽子新的自由市场政策。工业上放弃保护主义政策,减少政府的作用,对国有公司实行私有化。

在此期间人口增长开始减缓,但是由于在人口高峰期出生的年轻人进入了劳动市场,而且愈来愈多的妇女走上工作岗位,所以劳动力仍然以每年3.3%的速率持续增加。事实上,在80年代和90年代,妇女占去了新增在职就业人口的42%(PREALC,1992)。80年代晚期的城市人口失业率比1980年高,而在1983—1985年间失业率就已攀至最高点。

至于新增就业机会的质量,这10年可用“非正规化”程度和服务行业的增加来描述。个体经营、无酬家庭劳务、帮佣以及微型企业这些方面的就业增长显著。这些合计起来占了非农劳力总量的53%,从前是40%,10年间增长了一倍(PREALC,1992)。在这10年的后期,服务业占了城市就业的65%,而制造业则从38%降至35%,农业的就业人口持续减少(PREALC,1992)。

从80年代开始实施新的地区一体化战略以应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在安

第斯条约与中美洲共同市场之外,又新增了1991年启动的南方共同市场,将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扩招进来,而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也于1994年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国际移民的动向

移民潮的数量和概貌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迄至1990年,拉丁美洲全部人口的2.5%迁移到美洲其他国家,拉美移民占了全世界移民总量的9.2%。移民对人口的影响因地区而异,而移民在地理上的集中则对一些国家造成特殊的问题。

应该指出,国际移民对迁出国的人口影响不大;这方面的数据虽不大容易做比较,但国际迁出移民对人口造成的影响,其幅度不同于19世纪的欧洲国家所经历的。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的移民是当前这个地球上最大的移民运动,美国内部“拉美现象”的扩大已经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政治问题。

拉丁美洲作为一个移民迁入地区的标志已渐渐消逝。可以看到的是相反的移民运动,在过去主要的移民输入国家如阿根廷、委内瑞拉和巴西,其外来欧洲人和亚洲人的总量正在减少。而来自其他拉美国家移民的增加,也未能弥补前几十年欧洲和亚洲移民的死亡或回流人数。

在以往的50年里,与移民有关、规模空前且给经济和社会造成最大影响的事情,莫过于人口的城市化了。从乡村到城市以及各种不同形式的背井离乡,因为人口的高增长率以及生产方式的改变,给城市特别是主要城市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

这一过程不是在所有国家同时发生,同样强烈,但它已成为整个地区的现象,并使拉美国家的几个城市进入了世界最大城市的行列。

迄至60年代,这一带的国际移民还仅限于在相邻国家之间乡村至乡村或乡村至城市的人口迁移,而且主要是季节性移民。这类移民遍布全洲。国际移民的很大一部分实可以看作国内移民延伸过了国境。

这样的移民运动由各种不同的因素引起。政治边界大多于独立战争期间确定,强行分割了具有共同身份的社区。各地有着不同的人口密度,能用于生产的土地和劳力也不一样。越过边境通常并非难事。

19世纪和20世纪初,南美的阿根廷是欧洲移民的主要迁入国,对其毗邻国家的移民也有很大吸引力。这些移民最初瞄准的是边境地区,1950年代则开始转向城市,特别是布伊诺斯艾利斯,那里是工业发展和服务业的中心。

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也是传统的移民迁入国家(委内瑞拉接收哥伦比亚人,哥斯达黎加接收尼加拉瓜人,墨西哥接收危地马拉人)。数量最大的移民虽在墨西哥与美国之间,但不妨视同拉美国家之间的移民。

其他传统的移民多年来保持稳定或变化不大。这些恒定的移民运动(当人口普查足够频繁以记录它们时)从绝对意义上说并不醒目。举例来说,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海地人、巴拿马和厄瓜多尔的哥伦比亚人,都属此类。

移民目的地的变化始于60年代。拉丁美洲有愈来愈多的移民流向美国,加勒比地区的移民则流向加拿大。进而,70年代的石油危机加重了拉美国家经济增长的不平衡。产油国享受油价上涨的甜头,增加投资,繁荣经济。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

石油危机只是 80 年代危机的一个序曲。

委内瑞拉是石油生产国,经历了极大的变化,实行了旨在吸引专业和技术人员的政策。在 70 年代的大部分年头里,它实现了充分就业,按资力所付的工资等于或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其通货的兑换率高于美元。这些因素都意味着其迁入移民的汇款和储蓄能在他们的迁出国得到实际的增值。在 70—80 年代,从其他拉美国家迁入委内瑞拉的人口增加了两倍。而且,委内瑞拉吸引了这个次大陆所有地区的移民——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

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在 70 年代经历政治和经济危机,致使形成军人独裁,移民的数量显著增加,流向包括欧洲、澳大利亚、美国 and 加拿大等不同的地方。也流向其他拉美国家,主要是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哥斯达黎加。

一些中美洲国家都经历了乡村至乡村的越境移民。哥斯达黎加是主要的移民迁入国,这得益于它是那里发展最快的国家;其社会福利指标明显高于该地区其他国家,而且政治稳定,民主体制坚实。

自 70 年代中期,中美洲的动乱和暴力使这个地区出现了大量的人口流动。我们只大致掌握有关国内移民、国际移民以及在该地区或美国寻求避难或定居的难民的情况。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收集的信息——据难民接收国提供的资料,这个地区的移民数量在 90 年代初达到 116.3 万。接收国按难民数量依次为: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据报道,1993 年难民流入的数量在多数国家特别是哥斯达黎加已有下降,但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仍保持不变(Staton Russel, 1995)。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委员会(ECLAC)认为 80 年代是发展上“失败的

10 年”。这 10 年影响了国际移民,在传统的劳工迁入国(阿根廷和委内瑞拉),来自邻国的移民趋于平缓。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人移居美国,其次是加拿大。

表 1 包含了近几十年关于拉美移民动向的信息。地区性移民在 60 年代大约占了全部移民的 67%,而 90 年代初则占 31%(包括墨西哥流向美国的移民)。

拉美进入美国的移民,从 60 年代人口普查的约 100 万跃升至 90 年代近 850 万。其增长率在 1970—1980 年间较高,不过 1960—1990 年美国人口普查反映出各拉丁人社群的增长速度有显著不同。

从增长率上说,拉美移民的总量在 1970—1980 年间达至高峰,此后便有所下降。进入美国的移民大体显示了相近的趋势。然而,平均数下却掩藏了一些独特的形势。来自加勒比国家的移民在 1960—1970 年间达到顶点,这是由于当时在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及说英语的加勒比国家形成了流向美国的移民潮。来自墨西哥的移民在 1970—1980 年间达到高点,而几个中美洲国家——如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在 1980—1990 年间还保持较高的移民增长率。萨尔瓦多 90 年代的移民增长率与 80 年代相同。

虽然进入加拿大的移民在近 30 年间有显著增加,但与其他国相比,其数量仍少得多。加拿大的移民主要来自说英语的加勒比国家,特别是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圭亚那。加拿大与这些国家签署了雇佣临时工的特别协议。其次是海地向加拿大的移民为最多。以前海地的流亡者通常去魁北克,最初的居住点慢慢发展为社区。

关于在这一时期出现的移民现象,我们还可指出以下几点:

表 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迁出移民数量, 见于该地区各国以及美、加的人口普查

	迁出移民累积量				增长率		
	1960	1970	1980	1990	1960 - 1970	1970 - 1980	1980 - 1990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迁出移民总量	1 582 489	3 091 632	6 538 914	11 030 846	69.3	77.8	53.7
迁往美国的移民	908 309	1 803 970	4 372 487	8 407 837	71.0	92.6	67.6
从墨西哥迁往美国的移民	575 902	759 711	2 199 221	4 298 014	28.1	112.1	69.3
迁往美国的移民(不包括墨西哥)	332 407	1 044 259	2 173 266	4 109 823	121.3	76.0	65.8
迁往加拿大的移民 ^a		82 685	323 415	523 880		146.1	49.4
迁往拉美和加勒比其他国家的移民 ^b	674 180	1 204 977	1 843 012	2 099 129	59.8	43.4	13.1
迁往美国移民所占百分比(包括墨西哥)	57.4	58.4	66.9	76.2			
迁往美国移民所占百分比(不包括墨西哥)	33.0	44.8	50.1	61.0			
迁往加拿大移民所占百分比		2.7	4.9	4.7			
迁往拉美和加勒比其他国家移民所占百分比(包括墨西哥)	42.6	39.0	28.2	19.0			
迁往拉美和加勒比其他国家移民所占百分比(不包括墨西哥)	67.0	51.7	42.5	31.2			

^a 根据加拿大 1986 年至 1996 年人口普查数据。缺少 1960 年数据。

^b 1960 年的数字是根据 7 个国家的资料而来, 包括迁入委内瑞拉的拉美移民总数, 未算作国际移民。1970 年数字包括 20 个国家; 1980 年包括 19 个国家; 1990 年包括 18 个国家。

1. 巴拉圭的入境移民增加,主要是因为阿尔托巴拉那边境地区农民和农工的迁移。始于 70 年代巴西圭亚那人(Braziguayans)的迁移是件大事,对该地区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和地缘政治影响。巴拉圭 90 年代的人口普查中即含有 10 万以上的巴西人。
2. 在那些多少仍对移民开放的国家,秘鲁的迁出人数有所增加。据人口普查资料,在委内瑞拉、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前一时期增长最快的族群是秘鲁人。他们在美国的人数也在增长。
3. 从 80 年代开始,巴西明显成为一个移民输出国。除了上述进入巴拉圭的越境移民外,流向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移民也在增加。葡萄牙和日本是最初向巴西移民的国家,近来两国开始大量接收这些移民的后裔,让他们回归其祖先的国度。
4. 另外,前移民后裔的“回归”话题已在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出现。同样的事情也会落在最初移居秘鲁的日本人身上。

这项研究仅限于拉美国家之间和流向美国、加拿大的移民,而迁往发达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口也在增加。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曾形成流向欧洲的移民潮,较近时期其他拉美国家,主要是哥伦比亚、秘鲁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也在发生同样的事情。澳大利亚接收了来自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的移民,近期还接收了来自中美洲国家特别是萨尔瓦多的移民。如前所述,日本移民的后裔也从巴西和秘鲁返还其故国。

拉美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状况

拉美移民的教育背景和就业状况依他们出走时的条件 and 环境而不同,但通常更

取决于接收国劳动市场的需求。距离构成了一个选择条件,因为距离远就增加了迁移的代价和风险。而迁移的原因亦勾画了迁移者的景况。难民和从政治压迫下出逃的人,其背景要比迁移的劳工复杂。

据 1980 年和 1990 年的阿根廷人口普查资料,外来移民要比本国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低一截。只有乌拉圭移民是个例外,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很接近于阿根廷的平均水平。在以往的 10 年里,拉美移民的状况大多近似,但其中也有少量的专家和技术人员。超出常规的是秘鲁人,据统计,他们的移民量在近些年有所增加,而其受教育程度高出平均水平。秘鲁移民中有一大部分是专家和技术人员。

委内瑞拉实行了旨在吸引技术人才资源的政策,对来自哥伦比亚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越境移民(二者教育上均低于平均水平)和对教育水平较高的南部拉丁美洲和秘鲁的移民,明显不同。在 70 年代,委内瑞拉由于它的吸引技术移民和高薪政策,成为这个地区引入外国专家和技术人员最多的国家。移民的职业背景在近 10 年一直没有变化,但随着危机的爆发,其外来移民在数量上趋于平缓。

美国的一些拉美移民群比当地人受的教育要多。这也意味着比他们本国的平均水平要高。无论如何,在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异。中美洲和墨西哥的移民,流入邻近或接壤的国家,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低于接收国的平均水平,而且也大都低于他们本国的平均水平。然而,其他国家——委内瑞拉、巴拿马、智利、玻利维亚、秘鲁和阿根廷的移民,其受教育程度要高过本国和目的国的平均水平。

总的说来,来自南美洲国家和说英语的加勒比国家的移民,其平均教育水平较高。



1987年1月,海地太子港机场,一个管弦乐队在为排队的旅客表演。Billard 摄影/ UNHCR 供稿。

流向美国的大量移民,有许多是高科技人员,这说明移民的背景正日渐多样化。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有研究生学历(硕士、博士等)。虽然我们缺少比较数据,但许多有博士头衔的拉美人士生活在美国和各自的祖国,很可能是事实。

从就业状况的角度看,移民背景表明劳动市场的变化也影响着各类移民的比例。

根据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数据,当时产业工人的迁移是一广泛的现象。就地区性移民——特别是流向阿根廷和委内瑞拉城市——以及流向美国的移民而言,产业工人占了当时总就业人口的很大一部分。同样,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外迁也是拉美移

民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这部分人的战略性质,政治家和学术界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由于 80 年代危机的蔓延,地区性移民失去了势头,改变了状态。移民中从事个体经营和在服务、商业部门就职的多了。移民在劳动市场中趋于两极分化:一方面,高层次的移民谋到了专家、技术人员和经理的位置。另一方面,缺少技能的移民大多在最少专业化的部门从事个体服务和体力劳动。

最近的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其他国家也有不少拉美专业移民。这可能标示了这个洲的专业和技术劳动市场地区化的程度。需要其员工往来各国之间的跨国公司越来越多,此外还有国际组织,还有地区一体化

的管理机构等等。

这说明本地区日增的专业人员流动。不过美国接收了最多的移民,而墨西哥移民构成了迁入美国的专业人员的大头。在14个技术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中,美国竟占了13个。

据80年代和90年代的人口普查,拉丁美洲内部的技术移民,其中一大部分是居住在委内瑞拉的哥伦比亚人。其次是居住在阿根廷的乌拉圭人。

在技术移民的主要输出国中,有些国家,如玻利维亚,其专业和技术人员在本国工作人口中占的比例并不高,而另一些国家则比较高,例如阿根廷。这说明,人才过剩并不必然造成专业技术人员的外流,具体原因要看各国的具体情况。接收国所提供的机会是主要的原因。

图1标出了专业人员所占拉美各国工作人口的百分比,以及美国的人口普查资料中来自拉美各国的移民的类似数据。如图所示,来自中美洲——墨西哥和多米尼加等国的移民,在技能方面显示出“负选择性”。所谓“负选择性”是指,迁入美国的移民中专业和技术人员所占工作人口的比例,要低于在本国的比例。另一方面,居住在美国的委内瑞拉、智利、巴拿马、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玻利维亚、圭亚那和巴拉圭的移民,则显示出“正选择性”。图1只收入了可用于做此比较的数据,从中我们无法得出任何关于移民成因的结论。要想比泛泛之论更进一步(如把工资差距作为原因),就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从拉美的经历可得出什么一般性结论?

一些作者(Hatton and Williamson, 1994; Massey, 1998; Thomas, 1941, 1961)

试图从19世纪跨大西洋移民着手,找出解释这一现象背后的趋势,并预测未来的国际移民。拉丁美洲在过去的50年里已经从移民输入变为移民输出的大陆,这件事激励着人们去认识这一现象,从中得出一般性的结论。

人口增长及其对国家资源、可用土地、服务和就业造成的压力,已被认为是造成国际移民的决定性因素。只要对这种现象稍事一瞥,就可认为是人口的高速增长触发了常常跨越了国境的人口迁移。但事实上,一些国家是在特定情况下出现了大规模的国际移民,而其他国家却没有。这就对一般性假设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人口增长

从大而化之的意义上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人口快速增长之后,会有移民的增加。

1955—1965年间是人口增长最快的年代,10年过后,也就是那一拨出生儿长大可以进入劳动市场的时候,移民就显著增加了。然而,在这方面国与国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委内瑞拉曾经是一个主要的移民输入国,那时它的总人口及其工作年龄的人口都在快速增长。乌拉圭一直是一个主要的移民输出国,而其人口却是那个地区增长最慢的。

如果我们把移民对其本国人口的影响作为一个尺度,那么将那些国家排一个队,我们就会看到其他方面的情况。从根本上说,倒是(人口和地理意义上的)小国会大比例地流失其人口。这话不适用于墨西哥,它在人口和领土上是最大的国家之一,可却流失了其全部人口的5%(图2)。这就证实了兹洛特尼克(Zlotnik, 1997)研究国际移民动向所得出的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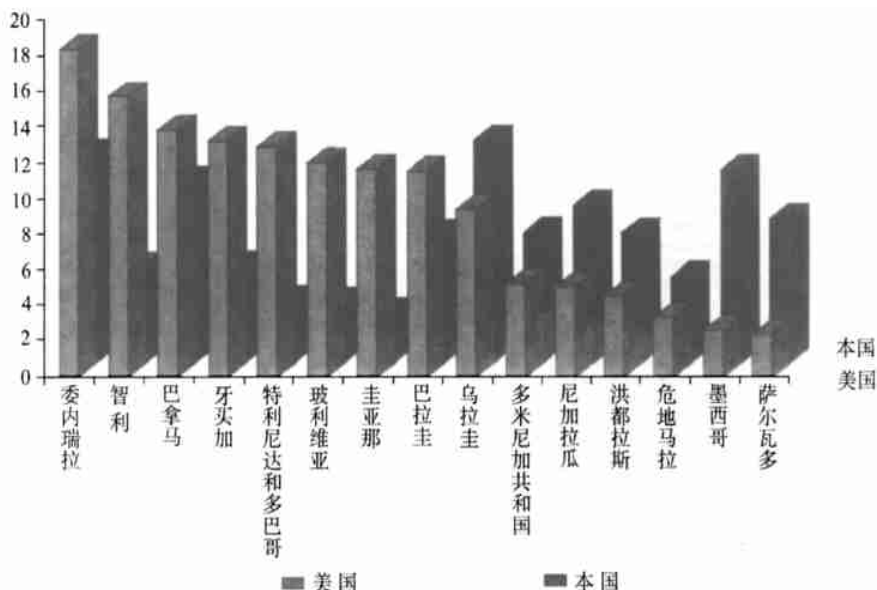


图 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出生的专业人员在和美国和其本国所占工作年龄人口的百分比, 1990 年概略统计。

经济增长

拉丁美洲的经济优劣不一。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 (许多情况下还包括 70 年代), 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上比发达国家同期的增长率要高。工业保护主义和鼓励进口替代的措施, 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及其劳动力水平的提高。在工业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 有的输出移民, 有的输入移民, 工业发展与移民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

但在工业和服务业集中的那些经济发展地区, 其人口有很快的增长 (如圣保罗和布伊诺斯艾利斯), 则是显而易见的。另外, 在墨西哥, 从乡村出走的大部分国内移民都集中到了墨西哥城; 同时期, 哥伦比亚扩张的城市人口则移居到了委内瑞拉。

简言之, 与都市化和工业发展相伴随的人口增长, 引发了人口流动。在拉丁美洲, 移民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和去向。不同

周边邻近地区的吸引力, 引发了不同的移民运动, 包括国内的和在国际的移民。

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 拉美各国都相继改变了保护本国工业发展和进口替代的政策, 代之以自由市场政策。后者断送了许多地方的传统工业, 随着政府作用的减少, 也导致了失业的增加和福利支出的削减。结果自然是多数人群的生活水平降低了。

由于就业危机, 出现了千千万万的个体经营, 其范围从高科技到手工粗活。这有助于人口的流动, 因为活命的一种战略就是依交往和接收信息所提供的机会而延展地理空间。

发达国家, 特别是美国, 采取的一种投资策略是把生产 (尤其是组装线) 转移到移民迁出国家。这样, 资本就流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地区, 省却了接收移民需付的社会代价。这种做法始于 60 年代中期, 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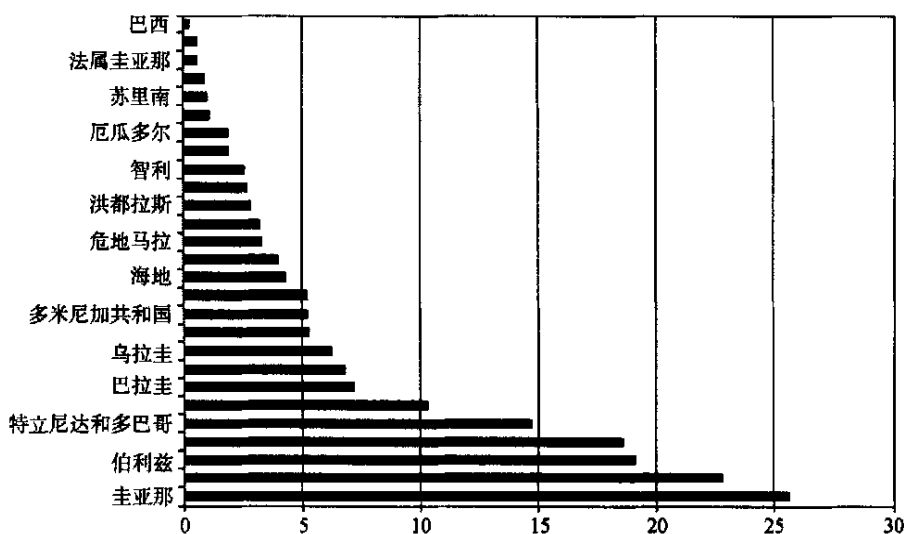


图 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外迁移民占本国总人口的百分比, 1990 年。

时美国决定中止引进墨西哥工人的计划, 也禁止从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区雇佣临时工。

没有迹象表明这种策略真能鼓励工人们留在本国。正相反, 在这种工业得到最大发展的那些国家(墨西哥、哥伦比亚和多米尼加共和国), 流入美国的移民却显著增加了。

萨斯凯·萨森(Saskia Sassen, 1988) 和利姆·莱恩·利姆(Lim Lean Lim, 1993) 都坚持认为, 这类经济整合措施是催促而不是劝解移民流动。实质上, 这种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对于当地社会具有破坏性, 它造成国内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 继而造成国际移民。相互依存造就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体系。这种关系不仅涉及经济, 也关乎政治、社会和文化。这说明国际移民运动并非收入或经济差距所能完全解释。

更多妇女从事组装线上的劳动, 造成了男女状况的不平衡, 致使男性移民增加。

进而——据萨森所说——在短期内雇佣年轻女工, 然后又解雇她们, 这也造成了大量的有打工经历的妇女失业, 从而成为潜在的移民。

除了以上一般情况外, 我们还必须强调, 向发达国家的移民是在那里需求劳工的背景下形成的。尽管工业化国家有着高失业率, 但其工作人口的老化和技术的变革仍在一些特殊岗位造成了瓶颈。劳动力市场的分化巩固了移民在一些特殊行业——运行“三等”或“低等”生产体制的服务业和工业——的实际主角位置, 这些行业的存亡全看它们能否得到劳力。

暴力驱逐

在拉丁美洲, 暴力无疑是驱迫移民离国出走的一个主要现象。社会暴力以及政治变更和独裁统治造成的暴力也许是形成移民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墨西哥和说英语的加勒比地区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暴力(至少在 20 世纪下半叶是如此), 这也说明

对于劳工迁移的原因不可同一而论。

多数情况下,一个初始事件的发生,触发了暴力的驱逐。流亡,然后形成网络和链条,导致移民的增加。在 60 年代,海地人、古巴人和多米尼加人投奔美国,巴拉圭人和玻利维亚人投奔阿根廷。在 70 年代,南美洲国家(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的独裁统治,伴随着经济危机,触发了地区内以及向欧洲、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的移民运动。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是中美洲的危机时期,有 100 万人背井离乡。显然,经济危机不能与政治暴力截然分开。若要划分哪些移民是暴力的牺牲品,哪些是经济困苦的牺牲品,绝非易事,因为二者通常是相互关联的。

美国的霸权

数十年来,许多作者都已强调了人口迁移的系统性。在驱逐和吸引两种因素之上,还应看到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国际舞台上盛行的霸权(Kritz et al., 1992)。

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外交政策,一直与两个地区之间的移民潮相关联。美国的霸权对于拉丁美洲的移民,以及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强大的影响。

整个 20 世纪,美国一直是拉丁美洲的首要出口市场及其进口货源地(……)。美国占的市场份额与距离的远近或呈反比(即加勒比地区高份额而拉美南锥体低份额),但它对整个拉丁美洲的支配地位则是确定无疑的(Bulmer Thomas, 1998, 243)。

事情当然不止于外贸,这个地区对于美国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于是就有直接的军事干预,于是就要对该地区的政府决策不停地施加干涉。

对拉美国家移民潮的任何一种分析,都必须首先着眼每个国家每个时代的具体情况(差异确实不小),同时还要考虑共同的大背景。对于拉丁美洲的大部分人口来说,美国已经成为引力的中心。在个人发展方面,即文化、复杂的价值观以及传达这些价值的复杂的机制方面,它已然是一块强大的磁石。这样的一般性印象固然难以落实为对个体迁移的一套确切解释,但它对于我们理解移民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近来的全球化进程迅速统一了人们的梦想,发达国家的特殊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在全世界大为流行。虽然各种文化和民族认同的复兴对此不无抵挡,但大部分人还是愈发希望能像发达世界那样生活。“美国式”的生活方式浸透了拉美社会。梦想发达而真实生活又没提供这样的机会,便会产生移民的倾向。对许多人来说,移民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了。

未来乃未定之天

未来的前景如何,现在还难以想象,因为新千年在未定中降临。全球化能消除多少不平等,起码让人怀疑。

从人口统计的角度看,所有国家都面临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尽管步调并不一致。然而,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人口潜力仍将对劳动市场构成压力,阻碍新一代人的进入。

经济指标在 90 年代初趋向于好转。尽管如此,经济增长却没有带来更多的平等,也未能缩小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从地区角度看,危机的扩延已使国与国之间移民的形势趋缓,下一步的一体化计划是否在人口分布方面造成大的变化,现在还很难说。

尽管发达国家对移民设置愈来愈多的屏障,多种因素却表明,它们对劳工的需求

仍将继续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人口老化要影响到技术资源的获取,服务领域越来越需要移民,这些似乎预示着在将来的几十年里,国际移民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还需指出的是,流动,即把个人经历国

际化的各式背井离乡固然是明显的趋势,但保持与祖国的联系,鼓励人们回归故里,血脉长连,事业与共,则是事情的另一面。

〔李存山译〕

注 释

1. 据 ECLAC (1980) 的统计,拉丁美洲的人均 GDP 在 1950—1978 年间增长了 1 倍,而欧共体国家在同期增长了 2.5 倍。
2. 贫困人口所占百分比从 1980 年的 41 % 上升到 1989 年的 44 %。到 80 年代末,拉丁美洲有 1.83 亿贫困人口,主要居住在城市地区。这一统计是根据 ECLAC 使用的衡量贫困的标准。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标准对于整个拉美大陆是相同的,如果在各国使用特殊的程序,那么贫困的水平无疑会更高。
3. 根据兹洛特尼克 (Zlotnik, 1997) 提供给联合国的数据,1990 年前后,移民总数达 119 761 000。
4. 20 世纪下半叶,萨尔瓦多和巴拉圭等国的移民占其总人口的比例达到 10 %—12 %。这一数字可能被低估了,但不会超过 15 %。加勒比地区各岛国的情况有所不同,那里的移民比例更高——在巴巴多斯和圭亚那高达 20 %。马塞 (Massey, 1988) 曾提出,不列颠群岛的移民比例为 41 %,挪威、葡萄牙和意大利的移民比例分别为 35 %、30 % 和 29 %。这里使用了不同的统计基数,马塞所说的是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的 80 多年的移民数,这与拉美各国 1990 年的移民统计不同。
5. 人口普查对移民一向低估。其他资料显示,1972—1978 年间,居住在巴拉圭的巴西移民达 25 万至 30 万 (Amorim Salim, 1995)。
6. 在 70 年代,欧洲各国接收从南美独裁国家出逃的政治难民和流亡者。其中,一部分移民重新获得了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在离家出走前的国籍。经合组织国家的 SOPEMI 提供的资料已经分国籍发表,这不利于获取有关此类迁出移民的信息。
7. 这里只计入了有可比资料的移民,前注也适用于此。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 AMORIM SALIM, C. 1995. 'A Questão dos Brasileiros e o Mercosul'. In N. Lopes Patarra, *Emigração e Imigração Internacionais no Brasil Contemporâneo*, Programa Interinstitucional de Avaliação e Acompanhamento das Migrações Internacionais, Campinas, Brazil.
- BULMER THOMAS, V. 1998. 'El área de libre comercio de las Américas'. *Cepal Review*, Special Issue, Cepal cincuenta años. Reflexiones sobr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pp. 243-258.
- ECLAC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1980. *América Latina en el umbral de los años 80*,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 ECLAC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1996. *The Economic Experience of the Last Fifteen Years.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1980-1995*.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 HATTON, T. and WILLIAMSON, H. G. 1994. 'What drove the mass migrations from Europe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 533-560.
- KRITZ, M., LIM LEAN, L. and ZLOTNIK, H. 1992.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ystems: A Global Approac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LIM LEAN, L. 1993. 'Growing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United Nations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Migration organized by the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ited Nations-UNFPA, Santa Cruz, Bolivia, 18-22 January 1993.
- MASSEY, D. 1998.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4: 383-414.
- MASSEY, D., ARGANGO, J., HUGO, G., KOUAOUCI, A., PELLEGRINO, A. and TAYLOR, J. E. 1998. *Worlds in Motio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PREALC (Programa Regional del Empleo par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1992. *Empleo y transformación productiva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Working Document No. 369.
- SASSEN, S. 1988. *The Mobility of Labor and Capit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ATON RUSSEL, S. 1995. 'Migration patterns of US foreign policy interest', pp. 39-87. In M. Teitelbaun and M. Weiner (eds), *Threatened Peoples, Threatened Borders: World Migration and US Policy*. New York: W.W. Norton & Co.
- TEITELBAUN, M. and WEINER, M. (eds), 1995. *Threatened Peoples, Threatened Borders: World Migration and US Policy*. New York: W.W. Norton & Co.
- THOMAS, B. 1961.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aris: UNESCO.
- THOMAS, D. 1941.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Swedish Population Movements. 1750-1933*.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 UNITED NATIONS (ECLAC-CELADE), 1993. *Population, Social Equity and Changing Production Patterns*. Santiago, Chile: United Nations.
- ZLOTNIK, H. 1997. 'Population growth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Century's End: Trends and Issues, Barcelona, 7-10 May 1997.

移越来越多,表明迁移已经成为一种生存策略。地区内的人才流动越来越多,尤其是流向经济快速增长的核心地区;劳工移民日益为商业移民所取代。由于北方国家移民法越来越严格,移民们开始在本地区寻找去处。人口的迅速增长、经济低靡、战乱、政局不稳、贫困蔓延和失业增加,都表明未来几年移民,包括难民,可能继续增加。如果齐心协力协调国家法律和地区、次地区协议,次地区经济联盟有可能促进地区内的劳动力流动。

[黄 觉译]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际移动方向

阿德拉 佩勒格里诺

本文考察了近几十年的国际移动方向,强调了拉美次大陆在以往 50 年间移民过程的特别之处。本文论述了拉美地区内移民运动的主要特点,以及 20 世纪后半叶的一大景观,即愈来愈多的移民流向美国。最后,作者探讨了国际移民的增加同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政治暴力对移民的影响,以及作为移民之首要原因的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作用。

[李存山译]

NAFTA 体系下的国际移民和劳动力 灵活性

亚利山得罗·卡那勒斯

本文为探讨 NAFTA 体系下经济一体化对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移民的规模、成分和形式可能带来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我们以为,对移民的可能影响,不来

自 NAFTA 之中,而是来自其背后的生产运作的变革。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墨西哥和美国采取了各种形式的劳动力灵活性策略,导致了劳动力市场形势的变化,而新形式的移民恰恰反映了这种变化。无论是墨西哥采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还是美国实行的经济结构调整,都在经济和产业的日益一体化进程中,推动了两国间贸易关系的重组。从这个意义上讲,北美经济组织内部劳动力的流动,实际上更取决于各国以及共同体内工作过程之间、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联系,而非一体化进程本身。

[王 佩译]

国际移民、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

劳尔·乌尔苏亚

社会科学若要在制订国际移民政策方面发挥更广泛的作用,需面对几个问题。社会科学的这一新任务牵涉到两大过程:一是全球化;二是人权之在全球获得普遍承认。两者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对政策的抉择产生影响。新近的研究工作已经证明:有人认为自南向北的迁移与贫困直接相关,许多政策建议也源于这一认识,但事实却不是这样。作者指出,政策建议和研究发现相矛盾,因为移民政策倚重经济理论。但经济学其实并未虑及相关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复杂性质,而这些因素当然也影响到移民的动机和迁徙过程。故而作者提出组织多学科的理论研究,认为这应当有助于设计较为有效的政策。本文也主张区分知识的概念性应用和工具性应用。

[陈 思译]